

戰爭與和平

L·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 高地合譯

Л·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 高地合譯

# 戰爭與和平

(一)

郭沫若題



---

# 戰 爭 與 和 平

著 者 L·托爾斯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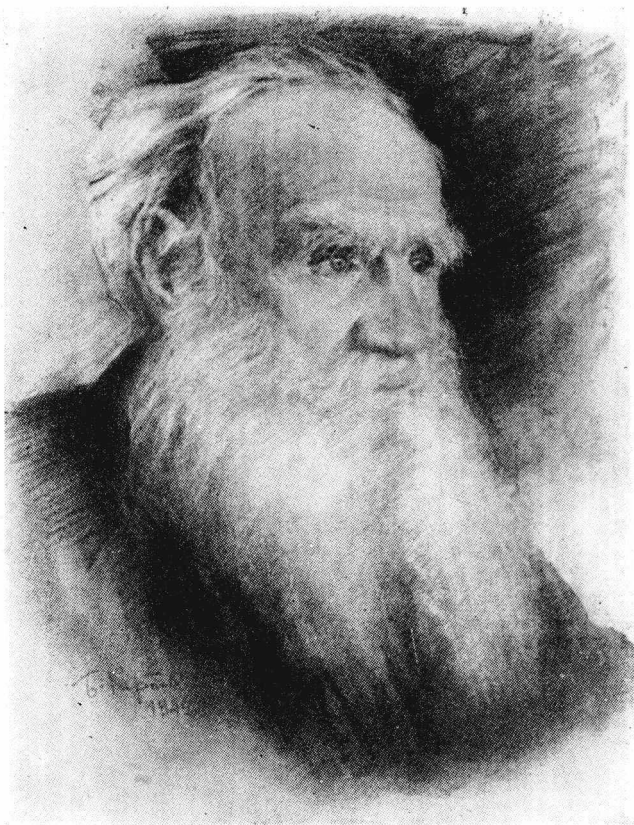
譯 者 郭沫若

出 版 者 駱 駝 書 店

上海北京西路六五七號

◇ 有版權 ◇

中華民國卅六年一月初版（一五〇〇冊）



Wm. Thompson



『她忽然跳上一隻花台，於是站得比他高，用雙手抱住他，於是她用細小袒露的手攬住他頸子上邊，仰頭把亂髮擺到腦後，正吻上他的嘴唇。』

（原文第六三面）



『他們向他表示了向來未表示過的尊敬：一個他不認識的和神甫在談話的婦人從自己位子上站起，給他坐位；一個副官拾起彼挨爾遺落的手套遞給了他。』（原文第一一六面）

# 序

郭沫若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着手翻譯已經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寄居在日本，生活十分窘促，上海的一家書店托人向我交涉，要我翻譯這部書，我主要的爲要解決生活，也就答應了。但認真說來，我實在不是本書的適當的譯者；因爲我不懂俄文，並不能從原文中把這部偉大的著作介紹過來。我使偷了巧，開始是用 Reclam 版的德譯本着手重譯，同時用英譯本和日譯本參照。在譯述的途中，我發現了我所根據的德譯本省略得太厲害了，於是便率性用 Garnett 的英譯本爲藍本，一直重譯了下去。（同時我也發現了一個祕密，便是米川正夫的日譯本，號稱爲是從原文直譯的，事實上只是 Garnett 本的重譯，其中還有一處大笑話，是把英文的 horse 「馬」同 house 「家」弄混淆了。）單祇敘述這一點，便可以知道我那譯本是怎樣不完全的一種東西了。更加以書店要急於出版，我是邊譯邊寄，書店也就是邊印邊出，因此連那書裏面的人名地名（據高地君的統計約有八百多）都譯得前後參差，譯文的草率自無庸說了。幸好譯到了將近一半的光景，書店因爲營業困難，不能繼續出版，連我的譯稿都還有一部分存在上海的内山書店（這一部分譯稿諒已遺失）未被取去，我也就把譯筆停止了下來。

這部書我本來是十分愛好，並十分希望把它完整地介紹過來的，自己的外國語能力既不適宜於介紹

，也曾經起過一番野心，想把俄文學好，捲土重來地作一個徹底的改譯，但俄文程度學習來只認得幾個字母，時輟時續地終久沒有成器。人到上了年紀，要從新學一種外國文，似乎確是一件難事。第一，專心致志的工夫就做不到，有許多事務來阻撓你，總使你無法進展。我自己是早把全譯的心事拋棄了。在日本時，曾經認識一位邢桐華君，他的俄文程度比較好，他曾經對我說，想把這書繼續譯完；我當時十分高興，覺得自己是卸下了一項重担，曾極力慫恿他，要他趁早動手。記得民國廿六年春間，在東京出版的質文雜誌（留東同學一部分愛好文學的人編印的，出到四期爲日本警察所禁止）上，邢君還登過預告，但在他尙未着手譯之前却遭了日本警察的迫害，把他抓去拘禁了一個時期，並強迫出境。邢君回國，不久蘆溝橋事變發生，他曾經隨過軍隊，並參加了政治部的工作，最近是病在桂林，關係喉頭結核，有朝不保夕之勢，他的翻譯工作，我知道是一直不曾着手的。

最近我真是欣幸，突然接到高地先生給我一封信，信裏面有這樣的一節：『最近我從原文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全部譯成，約一百萬言。先生的譯文從前曾拜讀過……也許先生所根據的原本不同，有些地方與原文小有出入……因爲本書前部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用了先生的譯文，甚至可以說是試驗的校補，所以我很願意和先生以合譯的名義出版，假若我的名字不至影響先生的威望，在我是十分榮幸的』。這樣謙和到極端的一種通信已就足能使人愉悅，更何況是十年來的一種遺憾突然得到滿足，真是有說不盡的快慰。我自然是立即便回復了高君，把我譯述的經過略略告訴了他，慫恿他迅速出版。至於



和我聯名的一層，在我倒反而是「十分榮幸」，但無此必要時，我勸他千萬不必這樣客氣。

不久高君也有回信來了，原來他也和那桐華君相熟。他說：「那桐華君在抗戰前，在南京和我同住一個院子裏，他對俄國文學的研究比我深多了，我們會常常談到先生在東島時的工作與生活。很可惜他的健康不好，使他未能展其所長。」這也要算是一段很有回味的因緣。將來，假使那桐華君能夠讀到這一段文字，我相信他一定也會愉悅的；因為他的未能實現的一項宏願，被他的友人替他實現了。

高君同時把全書的目錄寄了一份來，有校譯附言一篇敘述他從事譯述的經過和方法，又有關於作者及本書的介紹一篇，這些都是對於讀者的十分親切的嚮導。正文首尾數章的譯稿也寄了來，我都一一拜讀了。譯筆是很簡潔而忠實，同時也充分表現着譯者性格的謙沖與縝密。我對於高君雖尚無一面之識，但讀到這些資料使我感覺着十分的親熱，同時也就發生出了油然而起的敬意。在目前軍事擾攘的時期，高君竟有了這樣的毅力來完成了這樣宏大的一項工程，並且工作態度又那樣有責任心，絲毫不肯苟且。這怎麼也是值得令人佩服的。

譯文的一部分我過細讀了一遍之後，從前所懷抱過的一番野心又淡淡地甦醒了轉來。我很想趁這個機會把高君的譯稿來和原作對讀一遍，以爲我學習俄文的機會，同時對於譯文在有些地方想也可以略加潤色。但又一回想，我的時間終久是不會允許我的，僅是把出書的時期無謂地延長罷了。因此我也祇得讓我這個野心又漸漸地潛伏下去，假使是可能，且待全譯出版後再慢慢來實踐吧。

關於本書的譯出，高君一定要我和他聯名，我感覺着有些不安。我怕的是會竊取了高君的勞績和名譽。因此我要誠懇地向讀者奉告；我在這次的全譯上絲毫也沒有盡過點力量，這完全是高君一人的努力的結晶。假使這裏面的前半部多少還保存了一些我的舊譯在裏面，那也祇是經過高君淘取出來的金屑。金屑還混在沙裏面的時候，固是自然界的產物，但既經淘取出來，提煉成了一個整塊，那便是完全是淘金者的產物了。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於重慶。

# 譯校附言

高地

一

一九三一年和平的夏季，得英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即在八個月後，在次年一·二八戰事後，才開始將牠讀完。而這時（後來知道），郭沫若先生已開始翻譯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得原文的「戰爭與和平」，而規律地閱讀此書，巧合地，又是在八個月之後，在八·一三上海戰事後。

同年十一月下旬，在警報聲中，帶了這部書離南京，繞道到了武漢。在東湖邊，當我所敬佩的S先生談到各人在抗戰中的工作計劃時，我曾隨口說出翻譯此書之意。從前對翻譯與小說雖然有過一些關係，然而這個工作的繁重和自己文字修養的不夠，使我不敢着手。

一九三八年年初，因為聽說長沙方面可以找到職業，乃赴長沙。到了長沙後，我有機緣重行得到郭沫若先生的譯本（一、二、三冊）。論翻譯，在技術上，在修養上，郭先生是我引為模範的。那時我閑着，每天將郭先生的譯文與原文對看。郭先生的藍本有刪改處，因此郭先生的譯本便有了須添補之處，我便

順手在譯本上添補起來。同時我有了續譯完畢的意思，因為續譯，在我可以借用郭先生的譯文，省點時間和精力。

當時我聽說郭先生在長沙，待我打算去拜訪時，聽說他已離湘。我也就未通知他我的意思。

是年夏，得F先生的介紹，我入川教書。我轉武漢入川時，所帶的書只有數冊，這部書也在內。

我的工作的開始，是在七七週年紀念日後，在川東銅梁。那時業餘頗有閑暇，便逐日校譯抄寫一點，唯因為這個工作繁鉅，尚不敢堅信一定會做完畢，只可說是試試看，四個月中成績甚微。十一月底到成都，繼續進行，直至一九三八年終，所成的還是很少。

在一九三九年的開始，我在蓉開始利用餘暇有規律地做此工作，同年六月，我遷居新都縣，繼續工作，到十一月中，全部初稿竣事。不過工作並不那麼順利方便，例如夏大，日有蠅，夜有蚊，身內汗向外流，身外各種嘈音向耳朵裏擠，欲求一安靜之所，真覺難如蜀道。稿紙用的是白粉對方所印的，這一百萬字的抄寫，除了百分之一是用鋼筆外，其餘都是用毛筆，這也是一個不方便處。回想起來，好似經過長途旅行，爬過一串的困難，帶着疲倦的愉快走到了終點。

## 二

做這件工作，確是近于胆大。這在內，是由於我很愛好這本書；在外，是由于我在教書之餘閑暇尚

多，能夠每週譯二三萬字不等。還有，我的俄文程度是不好的，在這方面，邢桐華先生就比我更合式，但要等到能力充分時再做這工作，那就渺茫無期了，因此便大胆地冒昧進行並且完畢了。做這種工作，有英譯本參攷，托爾斯泰的文字算不得艱深，所以敢試，初稿一年餘的勞苦總算未落空。

這本書的文學價值，無論是在內容上在形式上，都無庸我在此多說，說也未必說得好。讀者們當然讀過托爾斯泰的若干作品，但讀過全部「戰爭與和平」的人還不多，牠的偉大處是值得讓讀者們欣賞的，在我所讀的外國小說中（當然是極少的）我最愛托爾斯泰的三個長篇，我愛，是從一個讀者和一個學習寫小說的人立場上去愛的。當然這本書也有短處，我在「關於作者與本書」中另有介紹，茲不贅。然文學傑作，也如人一樣，「不以一眚掩大德」，無論怎麼說，這本書是值得介紹的。

書中描寫戰爭的場面，是一般戰爭文學作者絕對寫不出的。俄國當時抗戰的情形，也可以讓我們借鑑。那時，帝俄受侵略，今日中國受侵略；那時，帝俄的軍隊向後退，甚至寧願放棄了莫斯科，爲的要長期抗戰，如總司令「庫圖索夫」所說的，「能夠救俄國的是軍隊，與其爲了保守一個城市而損失軍隊，毋寧失城而保留軍隊。」雖然在勝仗之後，還是後退，不管動搖份子如何動搖，他是守着這個原則「時間——忍耐」與拿破崙周旋，終於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誠然與我們的長期抗戰原則相合，而將士的英勇（例如主人翁之一的安德來郡王）更是今日中國戰士們的寫照。中國今日雖然失去若干城市，但主力尚在，且在加強中，爲了在文學傑作上，給中國讀者們一個「抗戰必勝」的例子，也是我譯此書的

一個原因。

書中描寫高等俄人的糊塗，不願捐助民團的情形，正是今日寓居香港及租界及後方的少數「顧家不顧國」的有錢人的諷刺。此外還有些情形，雖事在兩國，時隔百年，却宛然似是今日中國的事情，讀者看到這些地方，也許會驚異的。有一個人說過托爾斯泰是俄國當時上層社會的鏡鑑，那麼我們何妨借鑒一下。

我譯此書，還有一個期望，就是希望我國作家們也能寫出這樣大的或更大的作品，來紀念這個比拿破崙侵俄失敗更偉大的時代。當然，今日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意義上，在發展上，在廣深上，都與那個戰爭不同，戰爭的表現方式也不相同，如空軍、毒氣、經濟戰、文化戰，但有許多地方還是可以參攷的。托爾斯泰描寫戰爭的手法，這部書的佈局，牠的細處，牠的簡處，都可以供今日中國作家的參攷。我不是希望有人寫出在各面與「戰爭與和平」相似的作品，而是希望有人寫出在文學價值上與牠相等的作品。

三

按譯所本的原書是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的Academia版，印刷、裝訂、樣式皆相當講究。據原書前附口，這個版本是根據一八八六年「托氏文集」第五版而排印，並根據一八七三年「托氏文集」第三版，手

稿、校改稿有所更正（但仍有若干極小錯誤）。正文中夾用外國文，皆有俄文譯注，唯文字與語氣偶有差異；此類譯注的一部分根據一八八六年托氏文集第五版排印的，一部分是一九三五年版新加的，並有區別的符號，但中文譯本一律用中文譯出，無須分別加注。

關於參考方面，譯時只有一本俄英字典在手邊，許多字查不到，使工作感到不便。有時得精通俄語的同事說明疑難處，但困難還是有的。校閱初稿時，得借用露和辭典，却因為是翻版，字蹟模糊，且有字查不着，此時只好借用英文譯本的意思了。

譯時參考的英文譯本是 Garnett 的譯本，這個譯本有很多可借助之處，但也有些少錯誤。（英文譯本有 Vizetelly, Dole, Wiener, Garnett, Maude 五種，其中以 Maude 譯本最好，Garnett 譯本次之，此二種及 Dole 的譯本，譯者均曾看過。）

目前譯本的前部分可以說是郭沫若先生譯本的校補。後面的部分則是我另行譯出。校譯時爲了求合原文（不僅是在字眼上，而且還在句法上，因爲有些俄文句子較之西歐文句更近似中文句法），爲了前後筆調的統一，我會將郭沫若先生的譯文貿然任意更動，且偶有增補，又經過一番抄寫，故現在前部的譯文與郭先生譯文的原來面目是稍微不同了。

初譯完工後，我停了一個多月才開始重校。在此期間，託人在香港和上海買「露和辭典」，都無結果。同時，我爲了幾個名詞查了點參考書。

這時，我通知郭沫若先生這件事已做完，接到他的覆信，才知道他是先從德文譯本後據英文譯本翻譯的，而郭沫若先生的長者的無限好意，使我在校稿時，更想到苦中之樂。我很感謝郭先生，他許我貴然任意借用他的譯文，並助成這件工作。

今年一月，我開始逐句校對，并向朱光潛先生請借英文「毛德」譯本作參攷，他又轉向別人借到寄下。二月初，我收到英文「毛德」夫婦的譯本。這個譯本使我解決了不少困難。前面已校的又重行把自己不放心之處對照一過。第二卷以下的，對照「毛德」譯本處甚多。毛德的譯本，一如「加納特」的譯本，是根據不同的原文版本翻譯的，英譯本有時較原文本多半句或一句，皆加譯出來，因為英譯本所多的，從行文上看，有時正是原文所需的。但是主體上還是遵守原文的。稍微困難之處，我都是以原文、英譯、及譯文三種逐句對照，不妥處是減少了。

#### 四

原書正文中常常夾用外國文，其中以法文爲最多；夾用的外國文，有時是一字兩字，有時是一句兩句，有時是成段的，有時超過千字以上。原書中都有譯注，惟譯注與外國文偶有差異，譯者大體上是按照正文譯出。

原文版本上的小錯誤均會按照上下文的事實或行句間的意義加以更正。例如一卷九章開首的「



六月的」應爲「七月的」，因爲第一章開端寫的是一八〇五年七月。二卷一部一章中的「一年半」應爲「半年」，因爲尼考拉·羅斯托夫是一八〇五年秋從軍，「一八〇六年初」回家的。原文中的人名偶而拼綴不一致，如「奧西卜·巴斯捷夫」有時又爲「約瑟夫·巴斯捷夫。」此書于七年間寫成，人物衆多，小節目難免記不清楚，譯時均以先出現的爲標準。

譯本中的注釋有一小部分是譯者附加的。毛德的注釋我幾乎全部譯出。此外尙有少數原有的注釋。即以譯本的注釋共有三種，均皆於注末標明。

這個譯本，難免疏忽、誤解及不符原文處，如有，那是由於我的粗心和修養不夠。這應由我個人完全負責，並盼望高明之士惠然指教。假如譯本的誤解欠妥之處是減少了，那是由于加納特的，尤其是毛德夫婦的譯本的借助（毛德爲托氏好友，在俄二十三年，與托氏常相過從，毛德夫人是俄國人），托爾斯泰自認毛德的譯本是極好的。

## 五

原文往往一句達一二百字，爲了辭達而意顯，故時時採取了直譯意譯兼用方式。有時文句簡單，僅二三字，故往往在不晦澀的情形下照原文次序譯出。如「她錯了回答」，要順口一點，便是「她回答錯了」。俄文句法有時很像中文句法，形容詞及形容子句總是在名詞之前（形動詞則不然），譯文盡量求